

# 游牧学者拉铁摩尔在新英格兰

李若虹

1925年，拉铁摩尔在归化火车站看到徒步的游牧商队和运送货物的火车同时抵达，从骆驼背上卸下的货袋和火车车厢齐齐排成两行，那两行货物只有两三步之隔，却连接着足足两千年的历史。这一幕给拉铁摩尔留下了至深印象，不仅始终牵引着他往后学术研究的走向，也使他对于蒙古草原产生了无法割舍的依恋。

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1900—1989) 既没进过大学，也没有任何学位，可是，他不仅成为20世纪上半期研究亚洲内陆为数不多的重要学者，而且对这一领域的地理政治和生态环境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诸多专著，尤其是《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成为研究内陆亚洲的必读书。1992年我才第一次听说欧文·拉铁摩尔这个名字。那年年末，我将离开英国牛津大学，前往大洋彼岸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开始一段新的学业。临行之际，学友陈学毅说，做中亚研究的肯定要读拉铁摩尔，就在我的一本袖珍地图册的末页认真地写下了“Owen Lattimore”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到了康桥，我上的第一门课是蒂娜 (Elizabeth Endicott) 的“中国和内亚边疆关系史”。拉铁摩尔的名字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赫然出现在课表上。

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首府华盛顿，不到周岁就被父母带到中国（直到1928年夏才第一次回美）。襁褓中，他就开始了一辈子游走世界的生活。他的父亲大卫·拉铁摩尔 (David Lattimore) 是一名高中老师，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为了寻求收入更好的职业，决定离开美国、前往中国谋职。于是举家在1901年迁往上海，老拉铁摩尔任英语和法语

老师，后来又北上天津和保定任教。回美后，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College)。正是老拉铁摩尔，引导美国蒙古学的鼻祖柯立夫 (Francis Cleaves) 学习中文，引发他对蒙古学的兴趣。

拉铁摩尔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接受家教到12岁，之后被送往瑞士上学，开始了独立生活。他在英国上完高中后回到了中国，先在天津一家英国的棉纺织公司做进出口生意，后来在上海干过保险行业。他一边工作，一边得空就去中国内亚边疆旅行。虽然他读完高中之后就没再就学，但是以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经历和走万里路的体验使他学会了多门学科的最基本的知识。在天津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他学到了经济学。在中亚长途旅行时，他掌握了有关政治、经济以及所经之处的一手地方性知识。他年轻时对亚洲内陆的了解多半来自他丰富的游历，还来自他不同寻常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虽然旅途中随身携带着斯坦因的《中国沙漠废墟记》、贾鲁瑟的《未知的蒙古》和斯文·赫定的《外喜马拉雅》等等前辈的游记，但他显然不同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学者。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内蒙古边疆。我与当地专做蒙古和新疆贸易的商人谈话后，决定向我当时服务的公司辞职，而进行内陆旅行。”（唐



拉铁摩尔夫妇

晓峰译文) 漫漫旅途中，1925年他在归化（呼和浩特旧城）火车站所见的一幕成了一生的转折点。他在《边疆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一书中记载，徒步的游牧商队和运送货物的火车同时抵达归化火车站，从骆驼背上卸下的货袋和火车车厢齐齐排成两行，那两行货物只有两三步之隔，却连接着足足两千年的历史。他感叹道：“游牧商队在中亚大陆来回，长途跋涉在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而火车则彻底摧毁了内陆边疆已逝的历史，打开了通往未来的途径。”这一幕给拉铁摩尔留下了至深印象，不仅始终牵引着他往后学术研究的走向，也使他对于蒙古草原产生了无法割舍的依恋。由此而起，他对漠北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就在同一年，拉铁摩尔在北京和埃莉诺 (Eleanor Holgate) 相遇。当时，埃莉诺的父亲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 (Evanston, IL) 的西北大学来到中国休假，她随同父亲来到北京，从事艺术史方面的研究。拉铁摩尔和埃莉诺相识一年后结婚，不久即计划跨越亚洲内陆。他们分头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经过千辛万苦在新疆塔城团聚，然后开始了六个月的中亚蜜月之旅。夫妇俩坐着马车，先从塔城去乌鲁木齐，再到吐鲁番盆地，然后沿着盆地边缘，从吐鲁番到阿克苏、喀什、莎车。这对新婚夫妇结伴而行的乐趣可以从埃莉诺的一封信里看出：“我们欢快地奔走着，从塔城前往乌鲁木齐。有丈夫陪同真的比独行有趣多了，五天里我们走了三站地。不过，我们真的不在乎啥时候到达目

的地，甚至都不在乎有没有目的地！”他们最后穿过喀喇昆仑山口，翻越5000多米高的山峰，栉风沐雨，抵达印度斯利那加 (Srinagar)。他们一辈子相依相随的动荡生活就这么开始了。埃莉诺比拉铁摩尔年长五岁，陪伴拉铁摩尔走过了中国边疆和亚洲内陆的山山水水和崎岖险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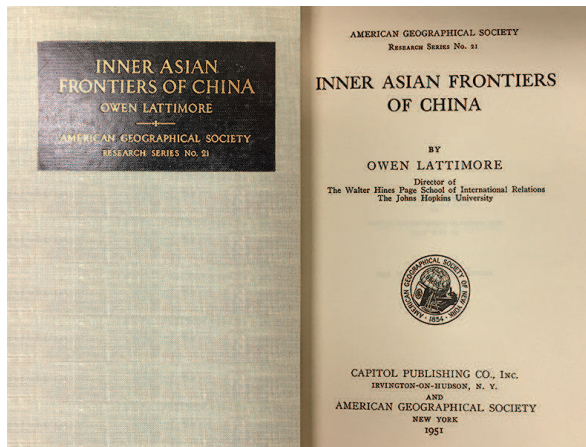
这次长途跋涉使得他完成了《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一书，此书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研究员亚瑟·欣克斯 (Arthur R. Hinks) 邀请他主讲学会的第三场“亚洲讲座”，而前两场的主讲人分别是斯坦因 (Aurel Stein) 和安德思 (Roy Chapman Andrews)。同时，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中亚研究学会》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赢得了美国地理学会主席以赛亚·鲍曼 (Isaiah Bowman, 1878—1950，后来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 的关注和赏识，获邀在美国地理学会发表演讲。鲍曼的推荐让拉铁摩尔申请到了美国社科研究协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的资助，拉铁摩尔此后走上了学术之旅。

1928年到1929年间的八个月，拉铁摩尔在社科研究协会的资助下，来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碧波地博物馆 (Peabody Museum) 进修。这是拉铁摩尔踏入学术圈之前，跻身高等学府的唯一一段时间。如果说归化火车站的一幕触发他对中亚的热爱，那么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学术牧人，在哈佛大学的这段短暂经历为他铺开了往后学术生涯的路径。

1920年代末置身哈佛园，拉铁摩尔适逢其时。他在人类学系认识了哈佛人类学系迪克森教授 (Roland B. Dixon, 1875—1934)，而迪克森又把他介绍给罗伯特·巴雷特 (Robert Meloyne Barrett, 1871—1969)。巴雷特富家出身，曾游历喜马拉雅山区，并出版了有关这一地区的系列游记，在1920年代



1928年到1929年间的八个月，拉铁摩尔在社科研究协会的资助下，来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碧波地博物馆进修。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出版